

都市问题研究论丛

主编：杨生平 副主编：强乃社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La Révolution urbaine

Henri Lefebvre

「法」亨利·列斐伏尔
——著

都市革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都市问题研究论丛

主编：杨生平 副主编：强乃社

都市革命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革命 /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656-3714-8

I. ①都… II. ①亨… ②刘… ③张… ④郑… III. ①城市管理—研究 IV.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5388 号

La Révolution urbaine

by Henri Lefebvre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7-8651

DUSHI GEMING

都市革命

[法]亨利·列斐伏尔 著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项目统筹 罗菁

责任编辑 孙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址 <http://cnpup.cnuc.edu.cn>

印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10mm×64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175 千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总 序

近年来中国在城镇化方面进展很快，城镇居民迅速增加，城镇化比例不断攀升。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在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何理解都市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状况，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探讨已经逐渐达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考虑甚至反思的程度，形成了从都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即有些学者所谓的都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 urban Marxism）。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影响减弱的悲观论调不同，我们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当代都市社会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推进。

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随后出现了不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的“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定的角度分析，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多的研究、传播和发展。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一定的时代与一定的地域相联系和相结合的结果。各种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甚至政治事件中亮相，从欧洲到非洲，

从亚洲到拉美，都是如此。这些马克思主义，有些直面当代现实，反映现实问题，切中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肯綮，赢得了很多听众。都市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都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众多经典作家和学者努力的结果。从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来看，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马克思那里，城市和乡村的二分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现象。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本逻辑形成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只要资本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社会的各种重要问题和矛盾将获解决，包括城市和乡村关系也将进入良性状态。

第一位对城市进行洞察并系统探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是恩格斯。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早期现代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剖析。资本主义固然在当时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问题也同时存在。社会严重分化、工人阶级处境悲惨、城市病凸显等，至今依然在一些地方存在。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城乡差别往往和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成为特别的关注对象。

到了20世纪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不同于苏联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了，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有了变化。如葛兰西等对城乡的理解和恩格斯不同，他认为这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有联系，和国际范围内资本的流动也有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和现代性有密切的联系，现代性在城市游荡。城市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窗口。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的城市重建，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也暴露了很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很多城市的规划将穷人赶到偏远郊区。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现代社会的主要形态之一就是城市社会或者其发展的较高阶段都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异常迅猛。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阶段和水平，有了另外一种比较明确的表现，那就是人类社会有一个从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社会的发展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时代产生了剧烈变化，如生产力发生重大发展，世界格局也发生深刻改变。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这个时候，地理、城市和空间因素在社会发展和变化中越来越重要。现代性的发展方式也遭遇到挑战，这在城市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各种社会疾病和城市疾病大量涌现。

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如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这些探讨往往和空间、地理研究有关，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都市社会的发展问题。对于城市社会和都市社会的重视是这些研究的共性之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逐渐在社会理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按照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的理解，大概在19世纪末期以前，社会理论还是兼顾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重要性的，但是到了后来，社会理论普遍重视时间、历史的维度，而忽视了空间的维度。这个认识直到列斐伏尔才彻底地扭转过来。

列斐伏尔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从1968年到1974年他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空间的著作。从整体上看，他不满意法国共产党跟随苏联的传统思想，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阐释；他认为时代已经经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了都市社会。都市社会是一个彻底城市化、都市化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地方已经进入都市社会，有些地方正在进入都市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坚持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但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做出了修正。

列斐伏尔的著作充满了启发，在表述上瑰丽多彩，他的论说是一道道的美味。但是，有时候人们对其确切含义很难精准判断，其主旨并不好掌握。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也在这种思想的丛林中跋涉，并获得异常丰富的启发和收获。从一定角度看，哈维从左边继承了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他彻底贯彻到空间批判和城市批判中。卡斯特从右边对列斐伏尔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试图发展城市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但是，他认为独立的空间和城市是不足的，比如城市问题取决于城市结构中的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城市社会运动和传统的运动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卡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不能应对当代问题。卡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视角并不能解决当代城市问题，也不能解决当代社会问题。他反对列斐伏尔对空间近似拜物教的重视。他是第一位写出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城市问题研究著作的人，他晚近的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说有些令人遗憾。那么，谁对列斐伏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继承？从大的线索看，可能是苏贾。

如何判断苏贾的学术线路？他经常将一种批判性的空间视

野作为自己著作的关键线索。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他坚持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视野来进行城市和区域研究。他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所谓的空间重述，对大都市进行了后现代话语的分析，对空间进行了第三者视角的处理。他以洛杉矶为基础，试图形成后现代的洛杉矶城市与区域研究学派，从这个城市案例中形成一个对其他城市有意义的普遍的启发。

苏贾似乎更多地继承了列斐伏尔的思想。从整体上看，列斐伏尔的思想和坚持现代性的线路是不同的，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揭露；他的空间研究，和现代性思想重视时间性的路线是不同的。在列斐伏尔那里，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后现代的感觉。他有解构，但是他也似乎努力做出建构，比如他在《都市革命》中对都市社会的展望。苏贾重视后现代主义对于城市理解的意义和价值。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寻求空间正义》(2010)中，对洛杉矶发生的工薪阶层要求公共交通巴士系统增加投资而诉讼进行了深入探讨，将城市工薪阶层的空间斗争，从政治和空间的互动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的来看，他对城市问题的理解是后现代视角的。甚至我们可以理解，在一个现代性的问题逐渐被揭露的时代，我们要解决现代性问题，除了重视后现代性，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但是，后现代性的理解有多重取向。在列斐伏尔的一些著作中，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和空间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可能需要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城市 and 空间的存在并发挥作用。在哈维那里，后现代性更多表现为资本主义问题在当代的显示。苏贾则认为，后现代性视角比现代性视角更加让我们容易理解当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苏贾提出的后现代城市研究中的不同话语，是对

现代性的固化、整体、标准化的社会生产的批判，是对明确的主客二分和对立的批评，是对工业时代确定的城市意象的变革。于是，后凯恩斯主义、后福特主义登场了，流动性、变化显著的城市发展和生产已经出现，真实的城市和虚拟的、信息化的城市已经很难截然区分，城市化中的单一中心的取向已经转向多中心、区域城市化的重构。但是，都市社会究竟走向何处？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没有给我们提供纲要或者说明。批判性的、解构性的标签可能和这种思潮的内在要求有很大关联。但是，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需要一种建构性的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主义至今依然幽暗不明。但有学者明确提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哈维不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建构性的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坚持都市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对寻求都市空间正义和争取城市权而言，我们目前能够寻求到的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苏贾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了寻求空间正义的重要性。而后现代主义者马歇尔·伯曼在关于纽约时代广场景观的著作的结尾，提醒我们要重视城市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参与城市景观建构的权利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即使是哈维也重视空间正义和城市权，虽然用正义和权利来解决资本的逻辑导致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如此。马克思对资本普照下的权利、正义，更多地采取了讽刺和批判的态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试图借助法律和权利摆脱困境，是找错了门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左派”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左派右转”。

但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直面当代很多问题。其中以当代都市社会为基础，围绕城市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代阶级问题、社会主义与城市、空间辩证法等主要问题形成整体思想。当然有关研究远不止这些内容，比如性别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空间与存在、历史等问题，也逐渐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步得到深化。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城市问题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表明城市其实已经成为革命的重大问题，而同时中国乡村建设派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对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忽视。有些国外研究者认为，在中国革命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所谓的反城市倾向，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盘踞在城市中的反动统治阶级，但并不反对城市。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展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进而言之，城市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仔细考察，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发展上来了。都市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和都市自身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在当代政治中，都市政治、街头政治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方面和形式。在经济活动中，城市聚集形成的效应已经影响到经济整体。文化的形成、发展等基本以城市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关都市社会

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课题。

我们重视世界范围内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重视都市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社会的理解和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更重视当代中国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工作。“都市问题研究论丛”著作的选择，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进行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代不断发展，空间频频变换。如今，信息化程度加速发展，赛博空间形成，深刻改变了当代的社会空间包括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及其关系，同时也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问题：在不平衡发展、空间关系方面，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加；在观念、制度与行动方面，是从城市出发回到农村，还是离开乡土回归都市，这对很多人来说，做出取舍并不容易。众所周知，在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回归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并不容易的问题，甚至地方认同和乡愁等都难以落地，更不用说在很多国家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殖民活动的影响尚且若隐若现；都市社会中的人们在社会快速变化中、在空间多点位移动中能够找到自己并非易事；日益普遍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走向智慧、绿色与生态之途，但城市顽疾也随之如影随形；对于城市发展形式而言，蔓延、紧缩并存，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互动。城市、农村、区域、空间、资本、市场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瑰丽画卷。

令人欣慰的是，在对城市、社会和空间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性研究中，近年来有很多问题已经受到了重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所要做的，是要打开、创造一个空间，在那里，能够去体味真正的时代精神，领略那给时代涂抹上底色的空间精神；在那里，我们能够回归自身、回归社会，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社会主义如何让人栖居于现代都市？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中译本代译序

刘怀玉

一、都市空间问题域的发现与都市马克思主义^①的三位代表人物

尼尔·罗伯特·史密斯(Neil Robert Smith, 1954—2012), 这位过早故去的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是大卫·哈维最杰出的弟子, 也是哈维由英国去美国任教的关键引路人。他在2003年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一书英文版作了一个质量很高的译序。他这样写道: “列斐伏尔的这部会

^① 关于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名称与来历可参看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引起争议的经典文本的英译本来得太迟了。”^①它印证了一部经典作品持久的生命力。《都市革命》初版于1970年^②，其时正值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刚刚结束。当时席卷全球的都市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从巴黎到底特律到东京、布拉格，再到墨西哥城。这是一场没有什么组织与目标、却有共鸣的多种多样的革命。这场革命于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中心当然是巴黎。列斐伏尔就是这场风暴中心的参与者与见证人，而《都市革命》是他的思想本身的产物，是非常冷静的、超出时代与专业的一本预言都市社会到来的哲学著作。列斐伏尔在写此书之前有过一段漫长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也有一段专门集中研究法国城市化设计的学术经历。该书与其著作《空间的生产》(1974)、《论城市权》(1968)等书一起构成了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系列与整体。

在列斐伏尔写此书的那个时代，占据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领航地位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与描述研究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关注仍然处于一种僵化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之中。通过把焦点集中到“都市革命”这个概念之上，他推翻了这个研究现状。透过都市革命这个术语，列斐伏尔试图研究比街头革命事件要深层得多的社会问题。街头革命只是这个重大历史变化阶段的一种局部的表面的征兆而已。“都市革命”这里指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与转移过程，这就是从农耕文明到工

① Neil Smith, “Foreword”, in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vii—xxiii.

②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业社会再到都市世界的巨型转变过程。按照列斐伏尔的论述，城市已经从原有的意义上走向了全新的时代。这是对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预告：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框架作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主导力量，已经不断地被都市化所替代了。都市总问题式正在占据优势地位。1968年的政治危机是更深刻的都市社会危机，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危机。

尼尔·史密斯有云，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列斐伏尔此书的重要意义方面之一就在于，他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包括北美世界的一个新的、广泛的社会理论研究领域。^①借用一下阿尔都塞的语言来说，列斐伏尔发现了一个“知识新大陆”，而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则是发现了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领域或者说“盲域”(le champ aveuglé)。他像福柯那样在讨论一个异托邦。当然，福柯的“异位”或“异托邦”概念只是歪打误撞地把人们引向一个时间与空间的世界，诸如墓地、购物中心、地毯、走廊等，而列斐伏尔则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语言来识别与想象异托邦，并将其置于更为广阔而深刻的政治化与历史性意义背景之中。列斐伏尔从整体—混合—私人三个层面来思考城市空间问题，并通过研究布尔迪厄和海德格尔思想，把私人空间定义为一个栖居的空间，认为栖居要比定居或居住早得多或者优先得多。栖居并不是抽象的空间或地方。

《都市革命》一书大多数内容是列斐伏尔长期研究的产物，并在后来的著名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但

^①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xi—xii.

这本书强烈而直接的政治现实性经验想象与激情，与后面充满学理气的城市空间研究明显不同。

空间问题在 20 世纪相当一段时间只是先锋的艺术、科学如物理或数学的研究领域，哲学与社会理论长期对此退避三舍、充耳不闻的。正如福柯所说：空间长期被视为僵化、静止、安静的国度，空间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盲区。^①

空间化转向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思想文化最基本的发展趋势之一。曾几何时，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而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福柯语）。但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空间开始取代时间成为诸多学科的重心。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甚至 19 世纪末，一些经典大师已经在空间问题并不时尚的年代就深入探讨过空间问题。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对此在的上手状态的周围世界的空间性进行过存在论分析，而在其晚期著作中，他则围绕着存在的历史与真理问题，对所谓“本有”的敞开与遮蔽、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技术集置与天地人神的“四合”、筑居与栖居的关系进行过讨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代化关键时刻的意大利南部与北部关系进行了探讨，巴什拉尔在《空间诗学》中对抒情诗的空间现象学想象，巴赫金对一系列小说的时空交错、文学中时间与空间关系内在联系的详细探讨，也属于空间理论的经典之列。而本雅明则得益于西美尔对柏林街头空间的陌生化体验，以惊人的梦游式的想象力

^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地理学》，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06 页。

捕捉到了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移动现象。

所有空间化转向思潮都向启蒙运动以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式与康德式空间概念发起了挑战。后者这种类似于牛顿力学的绝对空间概念把空间当作一个不同于主体即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或者把空间当作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的容器。与此类假设相反,那些形形色色的空间化转向的思想家们则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证明,空间本身既非“自在之物”,也非一种主观精神,而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与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西方的现代性因而被重新设想成为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与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与重组过程。^①

而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掌握着解放的承诺与希望,是从极权专制中解放出来,即从时间专制以及部分地从任何其他部门中解放出来的所在。但反过来说,空间也是社会压迫与剥削之所在。只有当我们停止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视野中思考空间与全球化问题,列斐伏尔的真知灼见才能被我们发现与理解。当《都市革命》一书最初写作之时,世界当然是等待着变革,但远没有开放到看见从空间角度空间方式理解政治的地步。从空间角度去政治性地思考这个被专业技术思想方式所深深包裹

^①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载[法]热拉尔·热奈特等著,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Literary Theory: An Essential Reade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47页。

着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与列斐伏尔所开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把都市想象为一个浓缩的全球或世界，同时把世界想象为一个都市，列斐伏尔当属其第一人。^①

当然，《都市革命》这本书刚刚开始的研究还很粗糙，且没有在人类实践与历史活动结果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空间，而只是从语言学等学科角度把城市空间简单地分为整体性、混合性与私人性，大体上与其所谓的国家、都市与栖居相对应。后来的《空间生产》一书则从更具体深刻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空间辩证法。这就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三位一体，还有超越抽象空间统治的差异性空间，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但此书问世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接受与理解，究其原因还是列斐伏尔后面提出的空间概念与思维方法还不为人知。换言之，这本书一经问世便遭遇到一个被广泛批判、“误解性接受”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其知名度在当初居然要比今天译成英文之时大得多，但这是一种被严重误解的命运。这本书遭批判之后被冷落，主要是因为它过早提出了两个概念——“都市化”与“全球化”，并欲以此取代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第一个批判这本书的是与他同时居住在巴黎的西班牙移民曼纽·卡斯特。当然，卡斯特的《城市问题》^②(1972)一书是对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一书的发展。该书首先承认，列斐

^①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 1999, P. 141.

^② Manuel Castells, *La Question urbaine*, Maspero, 1972.